北宋至明清殿阁构架的形制特点与历史源流探析 *

徐怡涛

内容提要　殿阁是《营造法式》记载的一种高等级抬梁式屋架，常见于唐宋辽金等时期的重要殿宇、楼阁之中，如佛光寺东大殿、应县木塔、独乐寺观音阁等。一般认为，抬梁式构架在金元以后日渐式微，至明清被厅堂构架所取代，但北京紫禁城中殿阁构架仍然广泛存在，与此同时，湖北、福建等地也存在一批明清时期的民间寺庙建筑，仍然保留着殿阁屋架。本文通过对比《营造法式》、宋元殿阁遗存实例、北京紫禁城明清殿阁实例和湖北、福建殿阁实例的殿阁形制类型在时空中的分布特点，提出了宋代以来存在三种殿阁屋架类型，其间具有一定的传承演变关系，北京紫禁城中的殿阁形式源于江南地区的南宋殿阁，不同于《营造法式》和元代北方地区的殿阁形制，也与湖北、福建等地的部分殿阁遗存有所不同。本文运用建筑考古学方法，以殿阁形制为研究焦点，所得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殿阁构架的历史演变、时空分布，以及明清北京紫禁城殿阁形制的历史渊源。

关键词　北京　紫禁城　殿阁　《营造法式》　北宋　明清

一　湖北、福建地区古建筑中现存的殿阁结构

于北宋崇宁三年(1104)镂版的《营造法式》[1]，对抬梁式屋架进行了分类，其中最重要的两种类型分别为殿阁和厅堂，相比厅堂结构，由柱网、铺作层和屋架组合而成的殿阁结构，是唐宋辽金元时期重要建筑的常见结构类型，但随着历史的演变，明清时期，不强调铺作层、结构更加简洁的厅堂结构应用越来越广，已成为抬梁式结构的主流形制，即便在重要建筑中，殿阁类型也已较为罕见，例如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三殿中，仅太和殿为殿阁结构，保和殿和中和殿皆为厅堂结构。太和殿外，紫禁城中的殿阁建筑还有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大殿，以及太庙大殿等。显然，明清时期，随着殿阁类型数量的明显减少，其象征性和重要性在官式建筑中反而得以提升。

与北方明清时期殿阁类型仅见于皇家建筑不同，南方在民间仍然可见殿阁类型。2016年11月，北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宋建筑史料编年研究”(项目编号：19ZD199)资助成果。

‹1›　徐怡涛《对北宋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时间的再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6期，第6—14、156页。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师生对湖北、福建的文物建筑进行了为期三周的田野踏查‹1›，发现了一批采用殿阁式结构的古建筑遗存，其形制记录详见[表一]。

[表一] **湖北、福建地区殿阁结构遗存实例基本信息表**

所在地	建筑名称	建筑年代	基本结构形制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荆州太晖观祖师殿	不早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2›	面阔进深各三间(檐步轩廊石柱各三间)、重檐歇山、殿身一间、满堂柱、殿阁造
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特区	紫霄宫紫霄殿	永乐十年(1412)‹3›	面阔进深各五间、重檐歇山殿、殿身面阔进深各三间、满堂柱、殿阁造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荆州玄妙观紫皇阁	万历十二年(1584)‹4›	面阔进深各三间、重檐歇山、殿身一间、满堂柱、殿阁造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荆州开元观祖师殿	万历二十六年(1598)‹5›	面阔进深各三间、殿身一间、重檐歇山、满堂柱、殿阁造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荆州文庙大成殿	雍正三年(1725)‹6›	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殿身面阔三间进深一间、满堂柱、殿阁造
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中房镇	罗源陈太尉宫大殿	宋代‹7›	面阔三间进深四间、重檐歇山顶、副阶后期加建，殿身面阔一间进深两间、殿阁造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绥安镇	漳浦文庙大成殿	洪武二年(1369)‹8›	面阔进深各五间、重檐歇山、殿身面阔进深各三间、满堂柱，殿阁造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石亭镇	漳州林氏宗祠大殿	具体年代不详，形制判断不晚于明早期‹9›	面阔进深各五间、重檐歇山、殿身面阔进深各三间、满堂柱、殿阁造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西桥街道	漳州文庙大成殿	成化十八年(1482)‹10›	面阔进深各五间、重檐歇山、殿身面阔进深各三间、满堂柱、殿阁造
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市昭阳街道	邵武宝严寺大殿	嘉靖十二年(1533)‹11›	面阔进深各五间、重檐歇山、殿身面阔进深各三间、满堂柱，明间后金柱移柱造、殿阁造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水北街镇	浦城云峰寺大殿	康熙二十七年(1688)‹12›	面阔三间进深四间、重檐歇山、殿身面阔一间进深两间、满堂柱、殿阁造
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河东乡	松溪罗汉寺大殿	康熙五十四年(1715)‹13›	面阔三间进深四间、重檐歇山顶、殿身面阔一间进深两间、移柱造扩大殿身开间、殿阁造

‹1› 田野踏查领队徐怡涛，考察队成员有佘向军、季宇、黄青岩、陈谚运、王一臻、罗登科、李松阳。

‹2› 王新生《荆州太晖观建筑艺术初探》，《华中建筑》2004年第3期，第133－136、142页。

‹3› 崔明《武当山紫霄殿玉虚殿玄帝殿大木作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76－79页。

‹4› 刘固盛、王凤英《荆州玄妙观元碑〈中兴路创建九老仙都宫记〉考论》，《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6期，第85－91页。

‹5› 丁家元《开元观古建筑初探》，《古建园林技术》1998年第1期，第40、42－45页。

‹6› 王新生、李正贵《荆州文庙大成殿维修勘察测绘报告》，《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第75－86、97、2页。

‹7› 张十庆《福建罗源陈太尉宫建筑》，《文物》1999年第1期，第67－75页。

‹8› 楼建龙《福建古代文庙建筑营造手法的规范性与区域性》，《福建文博》2010年第1期，第36－42、96－98页。

‹9› 杨丽华《漳州林氏宗祠》，《闽南日报》2008年10月22日C03版。

‹10› 陈木霖《漳州文庙大成殿建筑》，《古建园林技术》2000年第2期，第52－58页。

‹11› 殿内梁上题记：大明嘉靖拾贰年癸巳岁贰月贰拾贰日己卯吉时重新鼎建。

‹12› 殿内梁下题记：大清康熙贰拾柒年岁次戊辰桂月辛酉廿五乙丑良旦当代住持比丘……等共捐衣钵兼募众缘鼎新建造谨题。

‹13› 殿内额上题记：时清康熙五十四年岁次乙未仲春月重建。

[表一]所列案例，绝大部分建于明清时期，从所提炼出的殿阁结构形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案例跨越两省五市上千公里的空间距离‹1›，而具有显著的形制共性：

1、大多数实例为五开间或三开间的平面近方形建筑；

2、绝大多数实例为重檐歇山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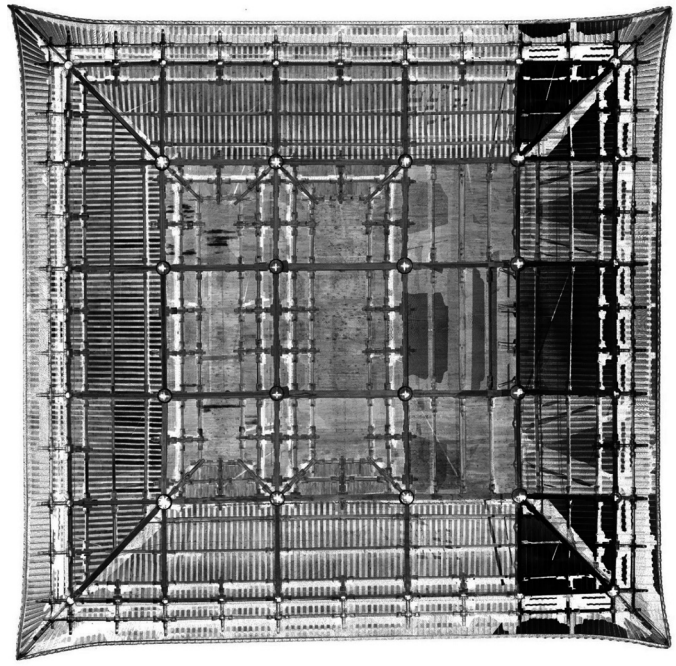
3、绝大多数实例的柱网为满堂柱。

[表一]中，非方形平面的建筑共4例，分别为：荆州文庙大成殿(1725年)5x3间、罗源陈太尉宫大殿(宋)3×4间(其中1×2为原构)、浦城云峰寺大殿(1688年)3×4间、松溪罗汉寺大殿(1715年)3×4间。如果考虑到浦城云峰寺大殿和松溪罗汉寺大殿为福建的清代建筑实例，荆州文庙大成殿为单檐建筑同时亦为清代建筑实例，而福建罗源陈太尉宫大殿为宋代建筑实例，则去除此四例后，[表一]中剩余的8处明代重檐歇山殿阁结构建筑，皆为方形平面和满堂柱做法(邵武宝严寺大殿在满堂柱基础上使用了移柱造)。考虑到这8处明代建筑，地处湖北、福建两省，位于十堰、荆州、南平和漳州四市境内，考虑其殿阁结构形制和建筑时代的一致性，再叠加地理分布的广泛性，可排除偶然性影响，从而使我们可以确认，此种形制至少分布于湖北至福建之间，至迟存续于明代，且为具有一定共性的殿阁结构形制。

二　湖北、福建地区明清殿阁结构形制特点举要及分析

由上述〔图一至图九〕的殿阁结构形制中，我们可

〔图一〕福建漳州漳浦县文庙大成殿(1369年)梁架仰视图(三维扫描点云切片)‹2›



〔图二〕漳浦县文庙大成殿(1369年)内槽仰视(全景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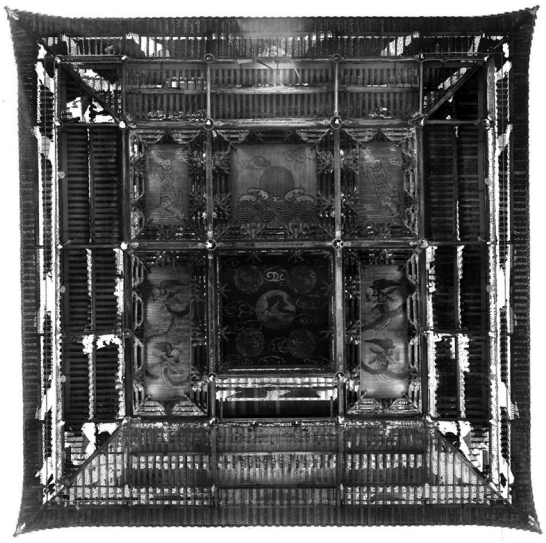
〔图三〕湖北十堰武当山紫霄宫紫霄殿(1412年)梁架仰视(全景截图)



‹1›　[表一]实例中，最北端的武当山紫霄宫紫霄殿与最南端的漳浦县文庙大成殿直线距离为1100余公里。

‹2›　本文所用[表一]中建筑案例的图像和测绘资料，均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2016年11月湖北福建考察田野记录成果。

〔图四〕福建南平邵武宝严寺大殿（1533年）梁架仰视图（三维扫描点云切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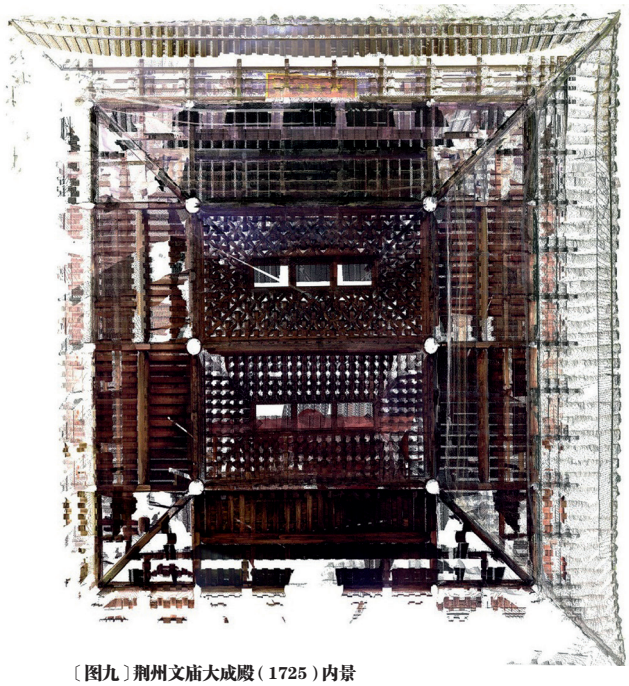
〔图五〕福建南平邵武宝严寺大殿（1533年）纵剖图（三维扫描点云切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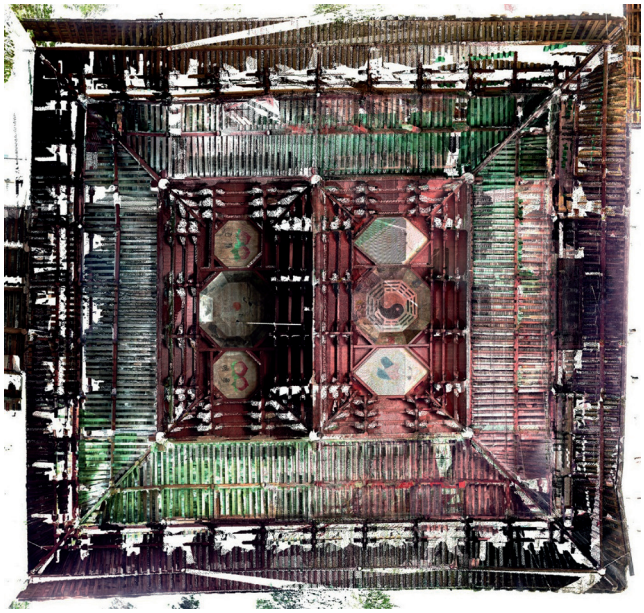
〔图六〕邵武宝严寺大殿（1533年）梁架仰视（全景截图）



〔图七〕福建南平浦城云峰寺大殿（1688年）梁架仰视图（三维扫描点云切片）



〔图八〕福建南平松溪罗汉寺大殿（1715年）梁架仰视图（三维扫描点云切片）



〔图九〕荆州文庙大成殿（1725）内景



以提炼出柱间内额连接方式和内额上斗栱布局形式的四种基本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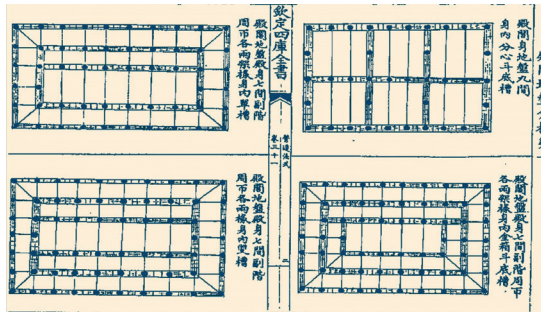
〔图十〕曲阳德宁殿殿阁结构内景



〔图十一〕曲阳德宁殿柱间殿阁结构仰视



〔图十二〕《营造法式》卷三一　殿阁地盘分槽（四库文渊阁本）



1、柱头间皆以内额相连，相邻四柱形成口字型内额布局，实例如漳浦县文庙大成殿（1369年）、紫霄宫紫霄殿（1412年）、南平浦城云峰寺大殿（1688年）、南平松溪罗汉寺大殿（1715年）、荆州文庙大成殿（1725年），［表一］中同类实例还有罗源陈太尉宫（宋）、荆州太晖观祖师殿（不早于1393年）、玄妙观紫皇阁（1584年）、开元观祖师殿（1598年）；

2、相邻四柱之间不形成或不完全形成口字型内额布局，实例如邵武宝严寺大殿（1533年）；

3、口字型内额上均匀分布斗栱，实例如武当紫霄宫紫霄殿、邵武宝严寺大殿、南平浦城云峰寺大殿、南平松溪罗汉寺大殿、荆州文庙大成殿，［表一］中同类实例还有荆州开元观祖师殿、太晖观祖师殿和玄妙观紫皇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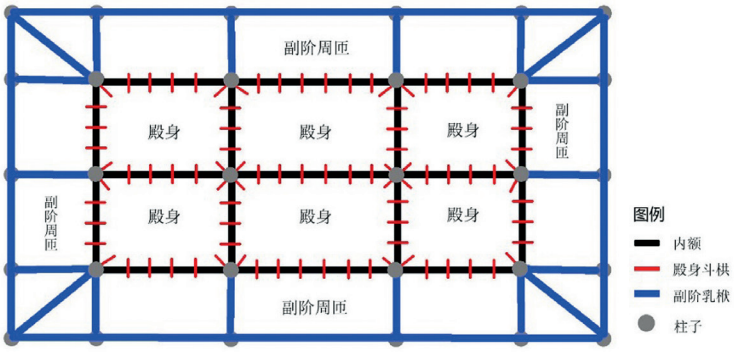
4、口字型内额上的斗栱布局不均匀，进深和开间方向的内额上所承斗栱形制不同，实例如罗源陈太尉宫（宋）、漳浦县文庙大成殿。

以上柱间内额连接和内额斗栱布局形制，再参考唐至元以来国内的其他殿阁实例，如五台山佛光寺大殿（857年）、蓟州区独乐寺山门（984年）、曲阳北岳庙德宁殿（1270年）〔图十，图十一〕[1]、《营造法式》（1104年）[2]殿阁地盘〔图十二〕等，本文提出满堂柱条件下的三种殿阁形制，分别以A、B、C三型指代，示意图如下〔图十三至图十五〕。

‹1› 崔金泽《河北省中南部地区明以前寺庙建筑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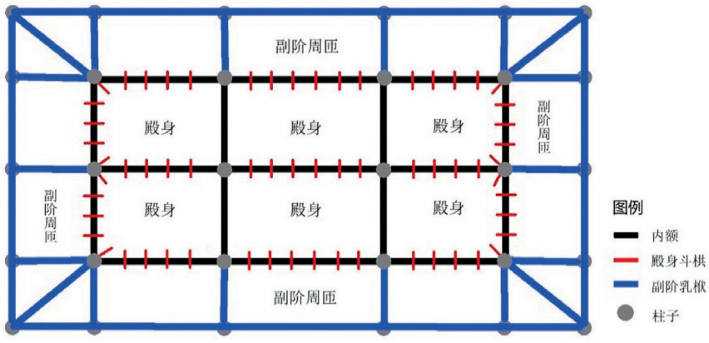
‹2› 徐怡涛《对北宋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时间的再认识》，《宋代〈营造法式〉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福州。

〔图十三〕C型殿阁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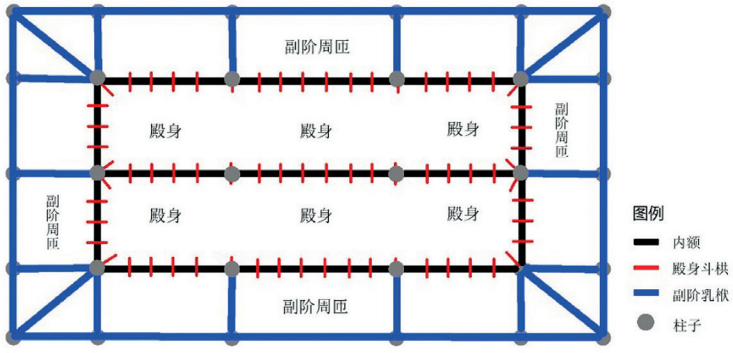
副阶周匝满堂柱殿阁造殿身内口字额及口字斗栱布局示意图

〔图十四〕B型殿阁结构



副阶周匝满堂柱殿阁造殿身内口字额非口字斗栱布局示意图

〔图十五〕A型殿阁结构



副阶周匝满堂柱殿阁造殿身内非口字额及口字斗栱布局示意图

湖北、福建明清时期殿阁结构，与唐、宋、元时期的实例及文献所记载的殿阁形制最大差异是：湖北、福建明清殿阁结构为本文所总结的C型和B型，其中C型为主流形制。而唐至元所常见的殿阁形制，在满堂柱情况下为A型，实例如蓟州区独乐寺山门(984年)，而在非满堂柱情况下，如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857年)、《营造法式》殿阁地盘图等，本文定义其为A0型，其柱头间与A型一样，不以十字内额相连，柱间横向的一字型内额与架于斗栱上的纵向梁栿构成框架，如〔图十四，图十五〕。

三　湖北、福建地区明清殿阁结构形制的渊源流变

由A、B、C三型殿阁实例的时间线分析，我们不难得出A型早于B、C两型的结论，但A型殿阁的传统，在其曾普遍分布的中国中原和北方地区并没有延续至明清。如果我们分析北京地区的明清官式建筑，就会发现，故宫中的重檐宫殿，依然使用着殿阁结构，如故宫午门大殿(1558年)‹1›、故宫太和殿大殿(1695年)‹2›，但其形制均为B型〔图十六，图十七〕。显然，A型殿阁经历了向B、C型转变的历程，但这种转变发生于何时、何地？是否存在转变的过渡类型呢？

建于南宋的苏州玄妙观三清殿(1179年)‹3›，重檐歇山顶，面阔九间进深六间，副阶周匝，殿

‹1›　徐怡涛《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斗栱形制分期研究——兼论故宫午门及奉先殿角科斗拱形制年代》，《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1期，第6－123、156页。

‹2›　张学芹、刘畅《康熙三十四年建太和殿大木结构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4期，第28－47、1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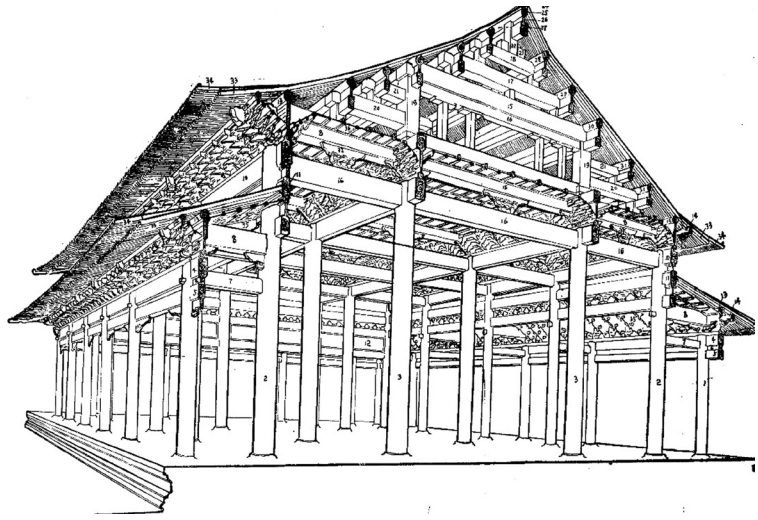
‹3›　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3期，1936年，第212页。

身面阔七间进深四间，满堂柱，殿身和殿内柱，大部分以十字内额连接，少部分以丁字连接，内额上斗栱非口字型布局，从殿阁形制上看，苏州玄妙观三清殿的殿阁形式与A(A0)型存在一定关联，即非口字型斗栱布局，存在非十字内额连接的殿柱。但总体上，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已经与北方唐辽宋元时期的典型殿阁具有了明显的不同，殿身和殿内柱间，大量十字连接的内额和满堂柱做法，已经与B型殿阁具有了明显的形制相似性。因此，苏州玄妙观三清殿或可视为A(A0)型向B型过渡的一处重要实例〔图十八至图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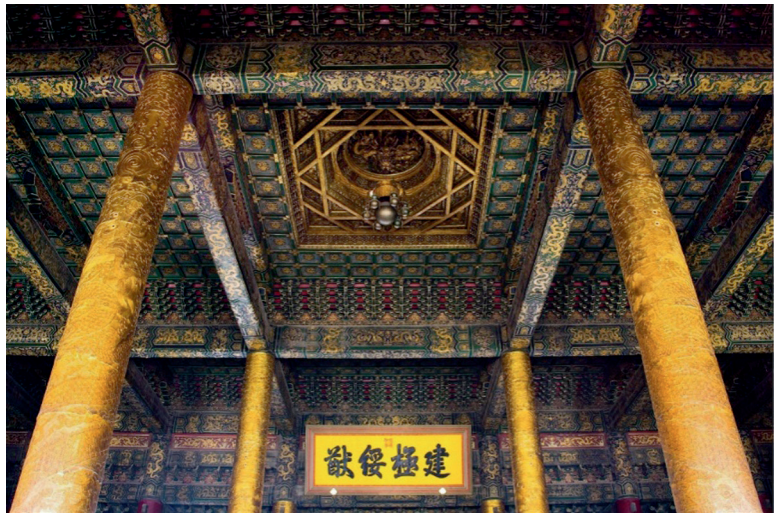
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平江府(苏州)重刊了《营造法式》，绍兴本《营造法式》的问世，对《营造法式》在江南的流传具有重要影响。《营造法式》殿阁地盘的分心槽做法中，部分殿内柱已存在柱间十字内额的连接方式〔见图十二〕。或许可以由此假设，《营造法式》在江南重刊后，江南建筑选择了分心斗底槽中出现的十字内额，作为殿阁柱间连接的主流形式，同时，满堂柱也取代了《营造法式》殿阁地盘中的减柱做法。

《营造法式》重刊34年后，苏州玄妙观三清殿的殿阁结构已大部分实现了从唐宋中原主流的A(A0)型向B型的转变。由于南宋时期，中原北方长期处于金和蒙古的统治之下，中原北方的经济、文化已不如南方发达，费工费料的殿阁结构日益式微，厅堂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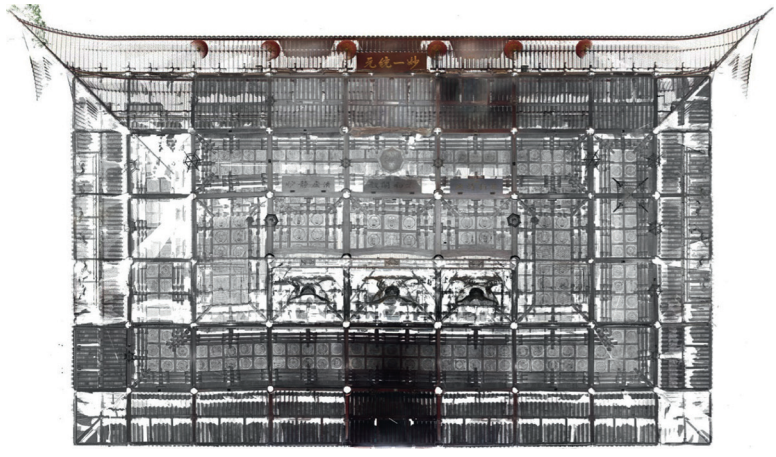
〔图十六〕太和殿梁架剖透图‹1›



〔图十七〕太和殿内景



〔图十八〕苏州玄妙观三清殿(1179年)梁架仰视(三维点云切片)



‹1›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第六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

〔图十九〕玄妙观三清殿内景1



〔图二十〕玄妙观三清殿内景2



构成为主流，而少数仍采用殿阁结构的建筑，其形制也缺乏演进，仍保持着唐宋以来的传统做法。即，在殿阁结构上，南宋取得了由A(A0)型向B型的发展，而金、蒙古统治的北方地区仍然保持着A(A0)型。

苏州是南宋的经济文化重镇，与南宋首都临安(杭州)的空间距离也不远，且联系密切，故我们有理由假设，南宋时期苏州与杭州的建筑形制应有较大的相似性。所以，我们在苏州玄妙观上所见的殿阁形制，大概率也存在于杭州地区，通过南宋时期苏杭地区所具有的经济和政治的文化影响力优势，B型殿阁得以在南宋境内传播。

B型及在其基础上发展出的C型殿阁，在南宋中后期的核心地带应已形成，经过百余年的传播，在宋末元初时期，已流布于原南宋境内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长期存在、发展。这应可以解释，为何湖北、福建相去一千多公里，在没有直接交流影响的前提下，却有着形制一致的殿阁建筑遗存。

四　殿阁形制的流变

那么，明清北京宫殿的B型殿阁由何而来？元朝统一了中国南北方，是否元朝放弃了A型殿阁转而采用了南方的B型殿阁营造宫殿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虽然已无法直接看到元代的宫殿建筑结构，但在公认的元官式建筑遗存中，无论是河北的德宁殿还是山西的永乐宫诸殿等，皆为A(A0)型殿阁，北方地区并不见B型殿阁存在的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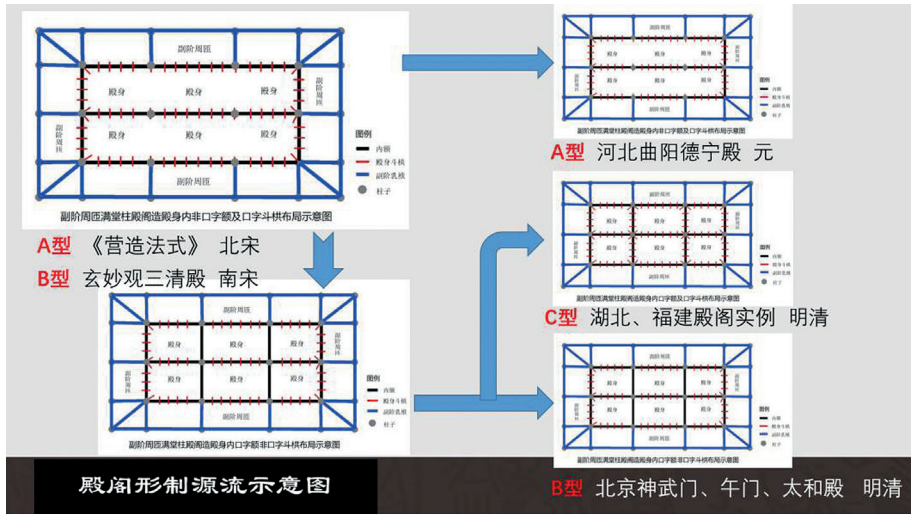
由此推断，元代的殿阁建筑形制仍然继续着南宋以来的南北方分野的特点，北方传统的A(A0)型殿阁并未因元代的统一而南下取代南方的B型殿阁。

而B型殿阁又如何成为明清北京官式建筑的殿阁形制呢？从文化传播影响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应与明初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并统一中国，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篡位，迁都北京，朱棣为标榜自身的正统性，仿照南京宫殿形制建设了北京紫禁城。清入关后，继承了明代遗留的官

式建筑形制。由此，B型殿阁完成了一次由南而北，由明而清的传递〔图二十一〕。

从现存实例分析，B型衍生出C型的时间应不晚于明初。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明清皇家建筑中只有B型殿阁，而无C型殿阁。虽然永乐帝支持营造的湖北武当紫霄宫紫霄殿为C型殿阁，但C型依然没有进入北京紫禁城的营造序列。

〔图二十一〕殿阁形制源流示意图



明清两代至今的六百多年间，南方的殿阁建筑依然存在于城市乡村的社会生活之中；而北方的殿阁建筑，虽然金碧辉煌，却已被禁锢于紫禁城之内，令普通人遥不可及。

五　结语

如果再结合唐宋至明清之间斗栱等其他大木作形制演变的认知，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官式建筑与民间建筑在大木作形制上的差异度，无论梁架还是斗栱，唐宋时期都明显小于明清时期。这一通过建筑考古学所揭示的建筑形制时空流变现象背后，是否映射了千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层面上更深刻的变化？或许对这一问题的准确回答，需要更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和关注。但无论如何，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已经通过古建筑烙印在中华大地之上，宫廷抑或山野，只要古建筑尚存，我们的文明即可追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